



· 社科大讲堂系列丛书 ·

SOCIAL SCIENCE
ENCYCLOPEDIA

哲学卷

社科大讲堂

主 编○刘迎秋 副主编○文学国



经济管理出版社
ECONOMY & MANAGEMENT PUBLISHING HOUSE



· 社科大讲堂系列丛书 ·

SOCIAL SCIENCE
ENCYCLOPEDIA

社科大讲堂

哲 学 卷

主 编○刘迎秋

副主编○文学国



经济管理出版社
ECONOMY & MANAGEMENT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社科大讲堂·哲学卷/刘迎秋主编. —北京: 经济管理出版社, 2010. 9

ISBN 978 - 7 - 5096 - 1099 - 2

I. ①社… II. ①刘… III. ①社会科学—文集②哲学—文集 IV. ①C53②B - 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186164 号

出版发行: 经济管理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北蜂窝 8 号中雅大厦 11 层

邮 编: 100038

电 话: (010) 51915602

印 刷: 世界知识印刷厂

经 销: 新华书店

组稿编辑: 陈 力

责任编辑: 陈 力 杨佛尘

技术编辑: 黄 铄

责任校对: 陈 颖

720mm × 1000mm/16 23.25 印张 442 千字

2011 年 3 月第 1 版 2011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56.00 元

书 号: ISBN 978 - 7 - 5096 - 1099 - 2

· 版权所有翻印必究 ·

凡购本社图书, 如有印装错误, 由本社读者服务部负责调换。

联系地址: 北京阜外月坛北小街 2 号

邮 编: 100836

电 话: (010) 68022974

前 言

“社科”，是社会科学的简称，现代的学术范畴。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社科”已经成为人们经济生活、政治生活、社会文化生活以及国际交流等方面的一个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现代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使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即便你对数、理、化非常精通，但是对“社科”却一无所知，那么，说你基本上还是“现代文盲”，可能不会过分。道理很简单，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一个不懂“社科”的人，要想理解现代市场经济及其发展过程中的众多纷繁复杂的经济社会现象，把握其运动、发展、变化的规律，哪怕这个规律是最简单的、最基本的，虽然不是根本不可能的，但一定是十分困难的，起码是要付出较多代价的。这也是为什么当代很多发达国家更重视社会科学家参与国是的一个重要原因。也正是由于社会科学家的参与，才较大幅度地提升了这些国家的治理及其运转质量与效率，加快了这些国家经济社会的发展和国民福祉的提升。当代国际政治和经济关系的发展经验也反复表明，一个国家在世界民族之林的感召力、影响力甚至领导力的大小，通常也是与这个国家的领导核心成员是否具备较高的社会科学修养和素质正相关的。

“大讲堂”，则是近年来才在中国流行起来的一个古典色彩十分浓重的现代概念。到目前为止，较为有名的类似概念，除了中央电视台的“百家讲坛”外，还陆续出现了北大的“世纪讲堂”、清华的“卓越讲堂”、南开的“南开讲堂”，等等。“讲堂”的英文表达是 **Lecture Room** 或 **Lecture Hall**，以表讲话、上课、传经授业的专门场所之意。实际上，此类传经授业的讲习场所自古就有。如据《后汉书·翟酺传》记载，“光武初兴，愍其荒废，起太学博士舍、内外讲堂，诸生横巷，为海内所集”，即“讲堂”早在古代社会就已经是讲学授业的一种重要方式。以后的历朝历代都少不了以“讲堂”做讲学授业之功。在历史上，类似的讲堂有很多。例如，清末民初曾有过著名的北洋陆军讲武堂和云南陆军讲武堂等。到了20世纪二三十年代，还出现了类似于讲堂的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该讲习所于1924年6月30日由林伯渠建议、由彭湃担任主任，7月3日正式开学），更有过在董必武等支持和帮助下于1927年3月由毛泽东创办的武昌中央农



民运动讲习所。到了当代，特别是随着中国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国力的强大，为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为满足人们对经济社会大转型时期出现的各类重大问题释疑解惑的迫切要求，“大讲堂”更是应运而生，并迅速成为名家云集、学子求知、有识之士实现思想碰撞与交锋的一个新的学术园地与场所。

这里奉献给广大读者的这个“社科大讲堂”，既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科前沿讲坛或名家讲坛的别称，又是云集各路学科带头人和理论大师学术思想与见解的再说。这个讲堂不仅囊括了多年来研究生院成功开设的“经济学前沿”、“法学前沿”、“史学理论与前沿”、“国际问题前沿”、“文学—文化前沿”、“马克思主义、哲学、宗教学前沿”等课程，而且进入这个讲堂传经授业的均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各研究所的学术大家和来自海内外的学界名流。这些讲坛以学术前沿性为主旨，同时强调学科内容的系统性。进入这些讲坛传经授业的专家教授的讲解更是主题鲜明、内容广博、深入浅出。正如读者在这套书中能够看到的，其中有很多讲演者的阐述和分析，虽然已经时隔几年，但现在读来都仍然具有非常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指导意义。

“社科大讲堂”这个概念不是我们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的发明，而是经济管理出版社的编辑们在总结、比较各类讲坛、讲堂的基础上提出来的。把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开设的上述前沿课程统称为“社科大讲堂”的想法一经他们提出，便得到了研究生院及各教学系的普遍响应与认可，“社科大讲堂”也就成了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开设的六大类前沿课程的总称。说来也是，在中国，有能力以此类形式十几年如一日长期举办这么多学术前沿专题报告的，可能也只有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是1978年8月经邓小平、叶剑英等老一辈党和国家领导人亲手圈阅批准设立的、直属中国社会科学院的高级专门人才培养基地。她既是我国最早成立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生院，也是我国人文社会科学学术大家最为集中的研究生院。研究生院秉承“实事求是、艰苦奋斗”的延安精神和“笃学、慎思、明辨、尚行”的校训理念，以更好地承担起中国社会科学院的“三个定位”（即马克思主义的坚强阵地、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殿堂、党中央国务院的思想库智囊团）要求为主旨，在研究生培养教育上做出了重要贡献。到2010年7月为止，由研究生院培养和授予硕士、博士学位的研究生共8300多名（其中，博士学位3000多名，硕士学位近5000名，专业硕士学位600多名）。数量虽远不及其他大学，但成才率极高。这些高级专门人才学成分赴祖国各条战线后，大都成长为我国政界、学术界、经济界的中坚力量和重要骨干。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也因此而扬名海内外。

30多年来，研究生院始终以培养优秀高级专门人才为己任，既高度重视研



研究生培养的政治质量和成才方向，又高度重视研究生培养的学术水平和实践能力。长期开设学术前沿讲座课，目的就是试图通过这样一种形式，着力开拓研究生的学术视野与思想境界，提升研究生的认识问题和分析问题的能力，指导研究生跟上时代发展的步伐，成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真正国之栋梁。集中国社会科学院六大学科片的优质教授资源，选聘国内外学术机构和名牌大学的著名学者参加，常年开设六大学术前沿讲座，是研究生院的一个创造，也是研究生院研究生学术研究能力和实际工作能力得到进一步提升的特别机制。30多年来，已有数千名（次）专家学者先后在这个大讲堂上分别就自己所长发表了深邃而精彩的学术演讲。今天呈现给广大读者的这套《社科大讲堂》，就是这些专家学者所做精彩学术讲演内容的密集压缩版。考虑到讲演内容的时限性特征，经与经济管理出版社认真协商，最后决定，《社科大讲堂》第一辑共八卷讲演稿的起讫时间选定为2004年至2009年。

《社科大讲堂》第一辑共八卷，即《哲学卷》、《政治学卷》、《史学卷》、《法学卷》、《文学卷》、《经济学卷》、《社会学卷》和《国际问题卷》。

《哲学卷》涉及中国哲学、西方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科技哲学、经济伦理学、文化哲学等多个专业方向。收录到这一卷的，既有哲学基本原理的讲述，又有关于哲学研究方法论的介绍；既有对哲学发展历程的回顾，又有对哲学学科发展方向的展望。兼顾哲学学科基本原理的讲述与前沿问题的研究是《哲学卷》的一大亮点。

《政治学卷》则围绕如何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这个主题，收录了10位学者所做精彩讲演，内容主要涉及民族问题、中国社会主义道路、中国政治体制建设和公共政策等，不乏尖锐、深刻的研究与讨论。

《史学卷》更有自己的特色。它汇集了中国史、世界史、考古学等领域的前沿研究成果和不同理论观点，展现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近代史研究所、考古研究所、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以及有关大专院校等学术研究机构众多专家学者在各自研究领域的最新学术成果。通读这一卷，可收到一卷在手便可通古识今的效果。

《法学卷》关注的是我国当前法制建设过程中遇到的一系列热点、难点问题，诸如私有财产保护问题、死刑存废问题、社会公平问题以及权利平等及其保护问题等等。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所及院外有关专家学者以其深邃的理论分析和精彩的课堂讲演，分别做了深入浅出的分析与阐述，无论读者从事什么职业，此卷均值得一读。

《文学卷》收录的讲演稿涉及范围较为广泛，讲演者中不仅有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语言学所、少文所、新闻所、外文所的专家，还有教育部语言文字应



用研究所等著名学术研究机构的专家学者。有关中国古典文学、现代和当代文学、文艺批评、民族文学理论、外国文学、新闻学、语言学等文学的各个领域的最新研究成果，基本上都在这里得到了较为充分的展现。

《经济学卷》是在众多国内外知名经济学家在研究生院所做学术报告基础上经整理最后形成的。这一卷收集的是这些专家当时所从事的理论研究的最新成果。这些成果涉及中国经济发展和体制转型过程中的一系列重大理论问题、难点和热点问题，可以说是百家争鸣、精彩纷呈、深入浅出，具有很高的学术理论价值和实际指导意义。

《社会学卷》共收录了9位学者的讲座内容，主要包括当前中国社会分层、城镇发展与新农村建设、社会保障、公共支出和社会政策等社会学研究的最新成果。除上述内容外，这一卷还收录了有关专家对“超级女声现象”的分析与解读和关于民间戒毒问题的人类学研究等讲演成果，似可为有兴趣的读者另眼一睹。

《国际问题卷》是我院“国际问题前沿”课程各路大家所做讲演的选编。“国际问题前沿”课程是我院国际教学部开设的学部专业基础课，也是我院的品牌课程之一。参与这一课程讲座的专家学者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国际学部八个研究所和中央有关部委及海内外知名大学，均为当代国际问题研究专家。读者阅读这一卷，不仅可以更清晰地看到这些专家学者们对国际问题所具有的真知灼见和深邃思考，而且可以由此更深刻地了解 and 把握时政热点，更正确地分析和认识国际形势的发展及其变化趋势。

今年，我们编辑出版《社科大讲堂》第一辑，既是对过去六年来我院“前沿课程”的一个总结，也是对我院研究生学术前沿教育的一次展现。从2010年开始，我们将采取每年编辑出版一辑的方式，尽可能及时地将我院最新前沿讲座成果呈现给广大读者。

在即将结束这个前言的时候，我想再在这里强调指出两点。第一，由于这套《社科大讲堂》所辑内容均是根据在我院前沿课堂上所做讲演稿整理而成的，虽然我们在编辑出版前也请所有参与讲座的专家学者做了校改，但仍然难免存在这样那样的缺点和不足。力求做到全书内容阐述精练、深入浅出、通俗易懂，力争使广大读者从中领略讲演者的思想魅力，是我们编辑这套《社科大讲堂》的一个重要目标。希望本书的广大读者能够从中获益。

第二，虽然我们的编委会对入选文章进行了严格筛选和认真编辑，但由于其中很多内容是演讲者对新时期面临的新问题所做的理论思考与探索，其个人观点未必能够得到他人认同。这就要求我们的广大读者能够以独立思考的精神指导自己的阅读，并由此展开更深入的讨论与批评。我们相信，善意的、建设性的讨论



与批评比被动地接受更重要、更具建设性、更有助于我国人文社会科学事业的发展 and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实现。

最后，借《社科大讲堂》第一辑付梓出版之际，我要在这里再次对为本书编辑出版做出努力、付出辛勤劳动的全体编委、经济管理出版社领导和责任编辑、研究生院各教学系秘书等参与编辑工作人员以及参与讲演稿修改定稿的全体专家学者们表示诚挚的谢意！祝我们的《社科大讲堂》越办越好！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院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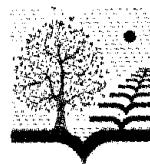
2010年12月8日于北京小倦游斋

DIRECTORY 目 录

社科大讲堂

SHI KE DA JIANG TANG
哲 学 卷

中西学术研究之异同	何星亮	(1)
价值与价值观	李德顺	(33)
关于经济伦理的几个问题	吴元梁	(49)
唯物史观的新内容	于 沛	(65)
当代美国实用主义	江 怡	(79)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EGA2 研究	魏小萍	(93)
历史认识:主体意识和主体的创造性	于 沛	(101)
哲学与当代思维方式变革	李德顺	(115)
中国哲学的价值观	李存山	(131)
信息哲学导论	刘 钢	(153)
文化多样性保护的国际趋势	章建刚	(183)
应用伦理学前沿问题	甘绍平	(197)
马克思的意识形态评判及其世界观方法论意义	侯惠勤	(209)
重新勘定西方哲学地图	江 怡	(225)
经济伦理学的研究现状及发展思路	孙春晨	(237)
什么是社会最根本的价值基准	甘绍平	(251)
中国哲学的系统及其特点	李存山	(263)
对技术化科学的哲学思考	段伟文	(277)
现代哲学的价值论转向及其意义	孙伟平	(295)
解读马克思:方法和路径	侯惠勤	(311)
文化相对论与跨学科研究方法	黄 行	(337)
多元主义与整体论视野中的科学	段伟文	(341)
后记		(357)



中西学术研究之异同

何星亮



何星亮

男，1956年生，广东省兴宁市人，博士。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研究员、宗教文化研究室主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第十届、十一届全国政协委员，全国政协民族和宗教委员会委员，中国民族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专家委员会委员，国家图书馆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曾任日本东洋文库、国学院大学、国立亚非语言文化研究所客座研究员。1993年被评为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

主要研究领域：①中国民族文化与宗教；②新疆民族历史与文化；③文化人类学理论与方法。

主要著作：《中国图腾文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1996）、《中国自然神与自然崇拜》（上海三联书店，1992，1995）、《龙族的图腾》（香港中华书局，1991；台湾中华书局，1993）、《维吾尔、柯尔克孜、哈萨克、乌兹别克、塔吉克、塔塔尔、俄罗斯、裕固、撒拉族文化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边界与民族——清代勘分中俄西北边界大臣的察合台、满、汉五件文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新疆民族传统社会与文化》（商务印书馆，2003）、《苍龙腾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8；陕西人民出版社，2008）、《中国民族学50年》（合著，人民出版社，2004）、《中国少数民族图腾崇拜》（五洲出版社，2006）、He Xingliang, Totemism in Chinese Minority Ethnic Groups (China Intercontinental Press, 2006)、《图腾与中国文化》（江苏人民出版社，2008）、《中国自然崇拜》（江苏人民出版社，2008）、《突厥史话》（与郭宏珍合著）（五洲传播出版社，2008）、He Xingliang, Guo Hongzhen, A History of Turks (China Intercontinental Press, 2008)。主编著作：《宗教信仰与民族文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中国人类学民族学百年重要著作提要》（知识产权出版社，2008）、《民族文化与全球化》（主编之一，民族出版社，2006）、《文化多样性与当代世界》（主编之一，民族出版社，2008）、《民族服饰与文化遗产研究》（主编之一，云南大学出版社，2005）和《民族学研究》等。主要译著：《哈萨克族》、《图腾崇拜》等。撰有研究生讲义《文化人类学概论》、《文化学原理》、《文化人类学理论》等。在国内外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和调查报告200多篇。



引 言

中西学术的源流和体系不同。中国学术源于先秦诸子百家，西方学术源于古希腊、古罗马。在2000多年的发展过程中，二者分别形成两种不同的体系。总的来说，中西学术各有所长，也各有所短。在21世纪，如何提升中国学术研究科学化的水平，是学术界急需探讨的一个问题。中国传统学术一方面要继承优秀的学术传统，抛弃不科学的成分；另一方面要充分吸收西方学术中有价值的理论和方法，使之与传统学术融为一体，才有可能使中国学术走向世界的前列。

众所周知，中国古代经验科技遥遥领先于西方。然而，为什么中国古代的经验科技未能向近代理论科学演变？为什么大多数近代自然科学的原理、定律及新技术，都是西方学者发现或发明的？为什么近代人文社会科学理论、范式和方法等，也主要是西方学者创立的？东西方人同在一个地球上居住，为什么在学术上有不同的结果？这些是值得我们深思的重要问题。笔者认为，其原因是多方面的，除了条件的限制之外，最主要的原因是大多数西方学者比较注重科学性，比较善于归纳，善于从个别性中归纳出一般性，从特殊性中研究普遍性。

关于中西学术的差异问题，老一辈学者作过一些探讨。例如，清末学者严复认为，西方科学的要害在“即物实测”，就是经验实证。他批判旧学墨守故训，或心成臆造，缺乏清晰的概念界定，总是缺少实证环节，所以“多诬”，无实无用。他还认识到，西方富强的基础在科学。有科学基础才可能正确认识社会问题，国民素质才能真正提高，从而才可能实现“修、齐、治、平”理想。他提倡以“自由为体”，以“民主为用”。^①章太炎等人提倡国学，反对武断的中西对立或比附，反对西化，主张保持传统学术精粹，主张中西“兼合”。^②

严复与章太炎等人在对待中西学问题上虽然观点不完全相同，但都主张吸收西方学术精华。然而，中西学术的差异表现在哪些方面，如何吸收西方学术的精华，他们并没有明确的论述。本文主要以人文社会科学为主，兼谈自然科学，从

^① 严复：《原强》，《严复集》第15册，中华书局，1986年，第11页。

^② 张茂泽：《清末学术观的变革》，《光明日报》2001年9月28日“历史”版。



治学目的、治学态度、治学方式等方面来分析中西学术研究的差异。

一、“求知”与“求用”

从学术研究的动机来看，最主要的有两种：一种是持“为实用而学问”的态度，即学术研究为人类、政治、现实服务。也就是说，学术研究是为了实用，即“求用”。另一种是持“为学问而学问”或“为学术而学术”的态度，即学术研究为了“求知”，探索自然和社会内在的规律、法则及其抽象理论。

近代以来，西方自然和社会科学的新理论、新方法层出不穷，与西方的治学目的和治学态度有关。西方知识分子偏重于“为学术而学术”的治学态度。亚里士多德在《形而上学》中说：古代希腊人“探索哲理只是想脱出愚蠢，显然，他们为求知而从事学术，并无任何实用的目的”。并认为，哲学是“自由学术”，是“为学术自身而成立的唯一学术”。^①

中国学术界之所以未能像西方学术界一样，创立众多的理论，也与中国学术界传统的治学态度和治学方法有关。中国历史上的人文学有两种传统：一为儒家的治学传统；二为道家的治学传统。王国维认为，儒家的治学传统属“帝王派”或国家派、贵族派、入世派，道家的治学传统属非“帝王派”或平民派、个人派、遁世派。^②

汉代之后，儒家的学术传统居于主流地位。儒家的治学态度偏重于“为实用而学问”，讲究实用，主张学术服务于政治、服务于国家。中国历史上的所谓经世致用之学，实质上就是“为实用而学问”的应用型学术。古代士人都抱有“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大志，并以此作为士人修身求知的至上目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是知识分子的座右铭。他们做学问的中心是“致用”，十分关心国家大事，上书皇帝，提出建议。自先秦时代开始，中国的士人们重视人生，讲究实用，漠视各种与现实无关的自然知识或抽象理论，形成一种“为实用学问”的风格。司马迁写的《史记》及后来的断代史，司马光写的《资治通鉴》等，主要目的是为了供统治者参考、借鉴治国治民的方法和经验。当然，学术为现实服务、为政治服务的提法本身并没有错。但是，过分强调功利主义，过分强调实用，必然会影响学术自身的发展，同时也影响学术为政治服务的质量。中国近代科学不发达，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理论贫乏，远远落后

^① 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商务印书馆，1981年，第5页。

^② 王国维：《屈子文学之精神》，《王国维遗书》卷五《静庵文集续编》，上海古籍书店，1983年，第32页。



于西方国家，这与“为实用而学问”的治学态度有密切的关系。

自然科学也一样，中国注重实用，而西方自然科学注重探寻自然和社会规律，因而也就形成两种不同的结果。例如天文学，中国古代天文学以“历法”作为主要内容，欧洲则以行星运动“规律”作为主要内容。商代甲骨文中便有许多关于日月食的记载，表明中国观察天文的起源很早。但中国古代天文学家观测天文的目的是定岁时，不断地改进历法，直接服务于农、牧业生产。西方天文学家则注重行星运动的规律，他们倾注很大力量，研究行星在星空背景中的运动，他们年复一年、精益求精地测量行星的位置和分析行星运动的规律，终于导致了16世纪第一个天文学学说——波兰天文学家哥白尼日心学说的创立。^①

地质学在中国的历史也很悠久，但古代中国人注重实用。公元132年张衡发明了世界上第一台地震仪，主要用来观测地震的方向，使朝廷能够较早地了解地震的方向，以便尽快做好救灾准备。然而，近代的地质学理论几乎全都是西方学者提出来的。

数学很早便在中国形成，但中西古代数学存在很大的差异。著名数学家吴文俊分析了中西数学研究方面的异同，认为中西数学的差异表现在多方面。其一，中国古代数学注重实数系统的一切运算法则与方法，这些都是十分实用的；而继承了巴比伦、埃及、希腊文化的欧洲，“则偏重于数的性质及这些性质间的逻辑关系的研究”。其二，在数学方程上，“中国古代数学致力于方程的具体求解，而导源于古希腊、埃及传统的欧洲数学则不同，一般致力于探究方程解的性质”。其三，在几何学方面，“中国几何学以测量与面积体积的量度为中心，古希腊的传统则重视形的性质与各种性质间的相互关系。欧几里得的《几何原本》，建立了用定义、公理、定理、证明构成的演绎体系，成为近代数学公理化的楷模，影响及于整个数学的发展。特别是平行公理的研究，导致了19世纪非欧几里得几何学的产生。”总的说来，中国古代数学“以构造性、计算性、程序化与机械化为其特色，以从问题出发进而解决问题为主要目标的独特体系”。而继承古希腊文化传统的欧洲“则着重思维，追求对宇宙的了解。由此发展成以抽象了的数学概念与性质及其相互间的逻辑依存关系为研究对象的公理化演绎体系”。^②虽然中国在公元前100年左右成书的《周髀算经》中记述了勾股定理，祖冲之在公元462年算出圆周率在3.1415926与3.1415927之间，但这些都是“求用”的动机下进行探索的结果。

力学在中国的起源也很早，几乎与古希腊同时，中国古代对平衡和简单的运

① 《中国大百科全书·天文学卷》“天文学”条。

② 《中国大百科全书·数学卷》“数学”条。



动形式就已具备相当水平的力学知识，但未建立任何力学理论。古希腊则不同，阿基米德对杠杆平衡、物体重心位置、物体在水中受到的浮力等方面作了系统研究，确定它们的基本规律，初步奠定了静力学即平衡理论的基础。^①

总的来说，中国古代自然科学注重技术、注重应用，不重视科学原理的探索。中国古代有辉煌的技术，如火药、造纸术、印刷术和指南针四大发明，但这些技术都是经验技术，是人们在长期的生产实践中发明的，不是在科学理论或原理的基础上推导出来并发明的技术；而西方现代技术都是在科学理论或原理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

梁启超早在 20 世纪初就批评中国知识分子的治学态度，指出病源在于“不以学问为目的而以为手段”，^② 其动机高尚者，以“致用”为信条，将学问作为变法改制的工具；其动机劣下者，则视学问为钩取功名的敲门砖，“过时则抛之而已”。认为“凡学问之为物，实应离‘致用’之意味而独立生存”，^③ “就纯粹的学者之见地论之，只当问成为学不成为学，不必问有用与无用，非如此则学问不能独立，不能发达”。^④ 他主张学者应有“学者的人格”，应该以学问自重，“断不以学问供学问以外的手段”。^⑤

王国维认为，“学术之发达，存在于其独立而已”。^⑥ 因此，他主张学术独立，学术与政治分开，不以学术为手段，而以学术为目的，以求真理为宗旨。他要求青年学生应以学术研究为有神圣价值的理想追求，不应以学术为升官发财的工具。他说：“吾国今日之学术界，一面当破中外之见，而一面毋以为政论之手段，则庶可有发达之日欤。”^⑦

梁、王所说的“学术独立”，主要是指不以学术为工具以达到其他目的。也就是说，学术研究的目的主要是“求知”，即探索真理。只有把自然和社会的规律、原理、法则研究清楚了，才有可能更好地为人类服务。萧公权也有类似的论述，他说：“为了使得教育发生它固有的功用，我们必须把学术自身看成一个目的，而不把它看成一个工具。国家社会应当有此认识，治学求学者的本人应该有此认识。所谓学术独立，其基本意义不过就是尊重学术，认学术具有本身的价值，不准滥用它以为达到其他目的之工具罢了。”^⑧

① 《中国大百科全书·力学卷》“力学”条。

②③ 朱维铮校注：《梁启超论清史学二种》，复旦大学出版社，1985 年，第 80 页。

④ 同②，第 40 页。

⑤ 同②，第 86 页。

⑥⑦ 王国维：《论近年之学术界》，《王国维遗书》卷五《静庵文集》，上海古籍书店，1983 年，第 97 页。

⑧ 萧公权：《学术独立之真谛》，《萧公权全集》之九，中国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3 年，第 248～249 页。



陈寅恪也认为，学术独立是现代学术的特征。他说：“吾国大学之职责，在求本国学术之独立，此今日之公论也。”^① 朱光潜对学术与实用的关系作了较为详尽的分析，他说：“学术原来有实用，以前人研究学术也大半因为它有实用，但人类思想逐渐发达，新机逐渐呈露，好奇心也一天强似一天，科学哲学都超过实用的目标，向求真理的路途去走了。真理固然有用，但纵使无用，科学家哲学家也绝不会就因此袖手吃闲饭。精密说起来，好奇与求知是人类天性。穿衣吃饭为履足自然的要求，求学术真理也不过为履足自然的要求。谁能说这个有实用，那个就没有实用呢？我们倘若要对于学术有所贡献，我们要趁早培养爱真理的精神，把实用主义放在第二层上。”^②

总的来说，“求知”是学术研究的第一目的，“求用”是学术研究的第二目的。两者不能颠倒，否则学术不能发达，“求用”的效果也就不会理想。

二、“求普遍性”与“求特殊性”

从学术研究的性质来看，学术研究的目的可分为两种：一种是“求普遍性”，即通过综合比较研究，探索事物或现象的本质和规律、原理、定律、法则、结构等，也就是探索自然和社会现象的普遍性。另一种是“求特殊性”，即探讨某种具体的自然或社会现象的发展过程及其特点，也就是研究某一具体事物、现象或事件的特殊性，分析其因果关系及变迁过程。西方学术界注重“求普遍性”，中国学术界则注重“求特殊性”。

西方自然科学十分注重一般原理、定律的研究，人文社会科学也一样，无论是研究历史、文化，抑或是社会、宗教等，西方学者注重探讨内在的规律、法则、结构等；而中国古今学者大多注重外显的、具体的现象或事物。尽管各人使用的方法不同，但研究的都是可观察的文化。例如，王国维运用“古史二重证据法”，即文献资料与考古资料相结合进行研究；傅斯年运用“语言文字比较的考据法”，即历史学与语言学结合起来进行研究；陈寅恪运用诗文互证考据法，即用历史的材料笺证诗文，又从诗文的材料中考订历史的真相。但他们所研究的内容主要是外显而具体的制度、风俗、宗教信仰及各种事件。

研究同一类问题，中西学术界研究的目的不相同。例如，研究各种社会冲突时（包括农民起义、工人起义、宗教冲突、民族冲突等），中国学者大多主要探讨冲突的原因、过程、结果及其影响，也就是主要探讨某一冲突的特殊事实。而

^① 陈寅恪：《吾国学术之现状及清华之职责》，《金明馆丛稿二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第318页。

^② 朱光潜：《怎样改造学术界》，《朱光潜全集》第8卷，安徽教育出版社，1993年，第25页。



西方学者探讨冲突的普遍性及冲突过程法则或原理，下面以德国和美国学者的研究为例来说明。

例 1：德国社会学家 G. 齐美尔（Georg Simmel, 1858 ~ 1918）关于冲突的研究。

齐美尔较早地研究了冲突的功能和冲突的强度与持续时间。他通过大量事实，归纳出如下具有普遍性的法则：

1. 冲突的功能

(1) 群体间的冲突越是激烈频繁，团体间的界限划分得越是清楚，而且不会消失。

(2) 冲突越激烈，冲突的各方就越有可能走向集权化，尤其是在群体整合程度不高的情况下。

(3) 冲突越是激烈，冲突各群体内部的团结也就越紧密。

(4) 在某一社会系统中，内部冲突越不激烈，冲突对社会系统的整合越有作用。

(5) 群体间冲突越激烈越持久，就越有助于在以前无联系的群体间形成联系。

(6) 群体间激烈冲突的威胁越是延长，冲突各方的联合就持久。^①

例如，“冷战”时期，以美苏为首的北约和华沙两大集团，面临激烈冲突的威胁长达 50 年，因而，两大集团的内部联合也相当稳定。“冷战”结束之后，华沙集团随后解体，北约内部也不像“冷战”时期那样团结紧密。

2. 冲突的强度

(1) 冲突双方情感投入越大，冲突就可能越激烈。

(2) 冲突参与者将冲突看做超越了个人目的和利益的程度越大，冲突越激烈。

(3) 冲突的目标越明确，冲突的强度就越小。^②

例 2：美国社会学家科塞关于冲突的研究。

L. A. 科塞（Lewis A. Coser, 1913）^③ 是 20 世纪 50 ~ 60 年代形成的社会学冲突学派的代表人物，他吸取了较多齐美尔的思想，建立了“冲突功能理论”

① 乔纳森·H. 特纳著：《社会学理论的结构》，吴曲辉等译，浙江人民出版社，1987 年，第 165 ~ 168 页。

② 同①，第 163 ~ 164 页。

③ 科塞（Lewis A. Coser）是美国著名社会学家，1913 年生于德国柏林一个犹太富商家庭。1941 年移居美国。1954 年获哥伦比亚大学社会学博士学位，师从著名结构功能派代表人物默顿。1975 年任美国社会学协会主席。他是当代美国社会冲突理论的主要代表人物。他的主要著作有：《社会冲突的功能》（1956）、《社会冲突研究续篇》（1967）、《理念的人》（1970）、《社会学思想大师》（1977）。